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武梁祠



中国古代
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美] 巫 鸿 著

柳 扬 岑 河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武 梁 祠

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

[美] 巫 鸿 著

柳 扬 岑 河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1989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 (美) 巫鸿著；柳扬，
岑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5

(开放的艺术史)

ISBN 978 - 7 - 108 - 05028 - 1

I. ①武… II. ①巫… ②柳… ③岑… III. ①武梁祠
画像石—研究 IV. 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4344 号

开放的艺术史丛书

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丛书主编 尹吉男

责任编辑 张琳 杨乐

特约编辑 邹清泉 徐津

版式设计 罗洪

封扉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288 千字 图 188 幅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图字 01—98—2025

定 价 6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巫 鴻

作者简介

巫鸿 (Wu Hung) 早年任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硕士。1987 年获哈佛大学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后在该校美术史系任教，1994 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2 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

其著作《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获 1989 年全美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李文森奖）；《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获评 1996 年杰出学术出版物，被列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最有意义的艺术学著作之一；《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获全美最佳美术史著作提名。参与编写《中国绘画三千年》（1997）、《剑桥中国先秦史》（1999）等。多次回国客座讲学，发起“汉唐之间”中国古代美术史、考古学研究系列国际讨论会，并主编三册论文集。

近年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研究与国际交流。策划展览《瞬间：90 年代末的中国实验艺术》（1998）、《在中国展览实验艺术》（2000）、《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2002）、《过去和未来之间：中国新影像展》（2004）和《“美”的协商》（2005）等，并编撰有关专著。所培养的学生现在美国各知名学府执中国美术史教席。

译者简介

柳 扬 先后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文学硕士，美术史和考古学博士。曾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言文学系讲师。现任悉尼国立新南威尔士艺术博物馆中国部主任，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学院高级研究员。著有《假面：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灵山：中国明清山水画》、《芬芳的空间：中国明清花鸟画》等六种英文专著及展览图录。新著《浸于深蓝：勿里洞沉船中的长沙窑瓷器》及研究早期道教石刻的英文专著即将出版。

岑 河 教师，从事一些中国美术史研究。

献给我的父母巫宝三、孙家琇

总序

尹吉男

主编这套丛书的动机十分朴素。中国艺术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艺术史,或者是中国学者的艺术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我们有全球艺术史的观念,作为具有长线文明史在中国地区所生成的艺术历程,自然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这份遗产的认识与理解不仅需要中国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也需要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工作。多元化的建设性工作更为重要。实际上,关于中国艺术史最有效的研究性写作既有中文形式,也有英文形式,甚至日文、俄文、法文、德文、朝鲜文等文字形式。不同地区的文化经验和立场对中国艺术史的解读又构成了新的文化遗产。

有关中国艺术史的知识与方法的进展得益于艺术史学者的研究与著述。20世纪完成了中国艺术史学的基本建构。这项建构应该体现在美术考古研究、卷轴画研究、传统绘画理论研究和鉴定研究上。当然,综合性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宗教学、文学史等学科的建构也为中国艺术史的进展提供了互动性的平台和动力。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把汉学与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完美地结合起来,不断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大陆的中国艺术史学曾经尝试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分析,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经验。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多元方法对艺术史的研究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选择一些重要的艺术史研究著作,并不是所有的成果与方法处在当今的学术前沿。有些研究的确是近几年推出的重要成果,有些则曾经是当时的前沿性的研究,构成我们现在的知识基础,在当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知识与方法。比如,作为丛书第一本的《礼仪中的美术》选编了巫鸿对中国早期和中古美术研究的主要论文三十一篇;而巫鸿在1989年出版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包华石(Martin Powers)在1991年出版的《早期中国的艺

术与政治表达》(*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柯律格(Craig Clunas)在1991年出版的《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巫鸿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等,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著作。像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万物:中国艺术中的大规模与模件化生产》(*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乔迅(Jonathan Hay)的《石涛:清初的绘画与现代性》(*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杨晓能的《另一种古史:青铜器上的纹饰、徽识与图形刻划解读》(*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 Décor, Pictographs, and Pictorial Inscriptions*)等都是2000年以来出版的著作。中国大陆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学者的重要著作也会陆续选编到这套丛书中。

除此之外,作为我个人的兴趣,对中国艺术史的现代知识系统生成的途径和条件以及知识生成的合法性也必须予以关注。那些艺术史的重要著述无疑都是研究这一领域的最好范本,从中可以比较和借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方式所产生的极其出色的艺术史写作,反思我们共同的知识成果。

视觉文化与图像文化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显示出来。这一现象也显著地反映在西方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字为核心的,而缺少同样理念的图像与视觉的新文化与之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不完全是提供给那些倾心于中国艺术史的人们去阅读的,同时也是提供给热爱文化史的人们备览的。

我唯一希望我们的编辑和译介工作具有最朴素的意义。

2005年4月17日于花家地西里书室

目 录

总序	尹吉男 I
序	费慰梅 1
导言	5

上 编 千年学术研究

第一章 武氏墓地遗存的发掘和初步研究	11
祠堂的配置与复原	19
祠堂主人及建造日期	31
祠堂及东汉墓地结构	37
第二章 武氏祠研究的历史回顾	49
传统学术	50
19世纪以来的综合研究	55
现代研究	59
对意义的探寻	67
考古学的启示	76
结论	79

下 编 武梁祠:宇宙之图像

第三章 屋顶:上天征兆	91
祥瑞形象及图录风格	94

征兆图像的流行	103
武梁和征兆图像	112
第四章 山墙:神仙世界	125
西王母与“阴”	128
西王母与昆仑山	135
西王母:从神仙到宗教偶像	142
偶像之表现:西王母及其仙境	149
第五章 墙壁:人类历史	161
墙壁图像的一般解读	161
汉代的史学观	167
古帝王和历史进化	174
“三纲”与列女、义士	184
君主与臣民之责	201
拜谒场景:君权的表现	208
历史学家的自我表现	227
跋:武梁祠石刻画像的思想观念	237

附 录

一 榜题、图像志、文本	253
征兆 古帝王 列女 孝子和义士 忠臣 刺客	
二 武梁祠研究年表	337
三 武氏祠画像石详目	342
四 引用文献目录	347
五 索引	359

序

费慰梅

公元151年建立的武梁祠原来矗立于山东东南部嘉祥县的武梁墓前。祠内三面墙壁和屋顶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画像,包括带翼的精灵、男女众人以及祥瑞之类,使这座祠堂遐迩闻名。这些石刻还具有丰富的榜题,它们是祠堂画像程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祠堂建筑规模不大,后墙仅约七尺宽,边墙的宽度不到五尺,然而它开放的前部和高敞的屋顶使人们可以很方便地进入祠堂上供并观赏内部的浮雕图画。

由于其艺术价值及画像的意义,这座祠堂从其诞生之日开始就应该是当地的一座重要建筑。但只是在经过了千百年的漫漫岁月以后,宋代金石学家才首次将它录入图籍。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些金石学家曾经亲自造访远离京城的武氏墓地,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通过购自古董商人的石刻拓片了解到武氏祠堂的画像。如果是由工艺娴熟的拓工所制,这种拓片能够极其精确地反映石刻画像及榜题的内容。由于拓片易于携带和收藏,对宋代金石家来

说,似乎反而没有必要亲自跑到遗址去看原来的刻石。

值得庆幸的是,过了大约六百年,一位名叫黄易的清代学者于1786年重新发现了武氏墓地。当时,持续发作的黄河泛滥已将祠堂之石冲得七零八落,大半埋入土中。黄易发掘出了大量画像石,而且卓有远见地建立起一座“保管室”来置放它们。本书首章叙述了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

根据黄易本人所称,这个保管室将为从石上拓印画像提供便利,而这些拓片又将使武氏祠画像广为流传。这两点他都讲对了。古董商将拓本携往他乡出售,不单是中国的收藏家,甚至远在日本、欧洲和美国的艺术爱好者也有机会获得拓片,欣赏和考证武氏祠画像。这些纸本“文件”便于研究,而且它们似乎具备了自己的生命。原来的石刻反倒鲜被注意,事实上成为制作石板画的版面,从上面一张张印刷品被无穷无尽地“揭下”。

由于这种境况，虽然武氏祠画像名扬天下，真正造访偏离通衢大道的武氏墓地的人却如凤毛麟角。在黄易来到此地一百年之后，著名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访问了该遗址，他或许是来到此地的第一位西方学者。沙畹一共去了武氏祠两次，第一次在1891年，然后是十六年后的1907年。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国北方考古考察》(1913年)随之成为研究武氏祠的西方学术经典。两位日本考古学家关野贞(Sekino Tei)和学者大村西崖(Ōmura Seigai)先后于1907年访问了该地，并出版了研究这个主题的重要日语专著。

巫鸿把为本书写序的荣誉给予了我，因为我作为一长串武氏墓地的造访者之一，也随后出版了研究这个专题的文章。大约关野贞来此地的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我在1934年访问了该遗址，随后于1941年发表了《武梁祠》一文。

距那次难忘的旅程已经有五十五年了。那时我唯一的准备工作是坐在北京

(那时叫北平)的家中，连续个把小时地做一件自我陶醉的工作——复原我所喜爱的武氏祠拓片。那时我尚未读过有关这些祠堂的任何文章，但我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当我最后来到保管室，我惊讶地发现有一些画像石是三角形的。它们中的一些立于地上，不仅呈三角形状，而且两面都刻有画像——无疑是建筑物的元件。很清楚，这些画像石不仅具有图像和文学的功能，而且原来是被设计为建筑的一部分的。它们究竟来自于什么建筑？作为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们原来是怎样配置的？这些问题激发起我的好奇心，促使我在回到美国之后专注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我最终在纸上完成了对武氏祠的复原，将它发表于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这个过程巫鸿在本书中做了描述。在数个世纪以来很多人的贡献中，我所做的是将众人的眼光吸引到画像所处位置的意义上来，而这种意义是与每座祠堂的整体装饰计划密切相关的。

现在,在黄易抢救那些散落的画像石两百年后,巫鸿在这本书里又为武梁祠建立起一座新的“保管室”,其中置放了他对各种散落的有关武氏祠的资料搜集结果,以及他对这些资料的创造性发现、推论和解说。书中包括了从祠堂初建伊始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资料,而他那种全方位的呈现和对各种证据的甄别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今后所有对武梁祠的研究都必须从此出发加以发展。此外,他对武梁祠墙壁上图绘历史的专门研究促使他深入探究多种早期文献,启迪了我们对汉代历史、文学、哲学及考古的理解。同时,这些研究也启发他提出自己崭新的、有洞察力的见解,如对于儒家宇宙观、武梁本人的图绘“签名”以及拜谒图中心人物身份的确定。所有这些都将使读者惊异,而且会带给他们极大启发。

巫鸿1945年出生于四川,在北京长大。高中时一位饱学的历史老师愿意辅助有兴趣的学生学习古典文献,巫鸿是两位

申请者之一,但另一位不久就退出了。在这位老师的亲授之下,巫鸿早年即培养出了他同时代人少有的阅读古典文献的功底,而这对他未来的研究可说是至关重要。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中央美院接受高等教育,主修美术史。“文革”中止了大学的教育,他被送到农村,但他设法携带了宋代金石书籍以及其他古典名著去阅读和背诵。1973年他被分到故宫工作。在那里,这位富于书卷气的年轻人将生命中的七年时间花在研究艺术品上,并得益于同事中专家学者的言传身教。1978年“文革”结束,大学重新招生,他回到中央美院,成为那里的美术史研究生。198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得到哈佛大学奖学金而负笈海外,于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 he 现在是哈佛大学美术史系教授。他告诉我说这本书是他融合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的一种尝试。

1989年写于马萨诸塞州之剑桥

导 言

武氏墓地位于山东省嘉祥县南边约十五公里之处。这座东汉官吏的家族墓地坐落在紫云山南麓,那是众多散布于黄河下游广袤平原上的小山丘之一。墓地中的地上遗存包括多种石刻,有双阙、圆雕动物以及出自残毁祠堂的大量画像石。武梁祠即是这些祠堂中的一座。之所以称为武梁祠,是由于该石祠是为武氏家族成员之一武梁(公元78—151)而建。

对武梁祠的研究可说是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史中一个特殊分支。以下几个事实使得这项研究尤其重要。第一,武梁祠是武氏墓地中唯一可以完整复原的祠堂。事实上,它是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的2世纪的祠堂,而2世纪又是中国古代修建祠堂建筑的黄金年代。第二,该祠堂内部墙壁上满饰浮雕画像,就其艺术的完美和主题的丰富而言,在那个时代里堪称是最出色的。这些石刻多数伴有榜题,这为东汉画像的图像志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证据。而且还有一块与武梁祠相应的石

碑铭文被著录下来,从而为了解石祠的建立年代以及祠主人的生平提供了信息。也许最重要的是,武梁祠石刻展示了一个统一连贯、不同凡响的画像程序。这些图像乃是根据东汉的宇宙观而设计,其所表现的宇宙由天、仙界和人间这三个相辅相成的部分组成。

第三,武梁祠之所以在中国艺术史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还由于学术界对它的长期重视。中国学者从宋代起就已开始研究这座祠堂。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武梁祠石刻以其蕴含的极为丰富的研究多样性对中国艺术研究者不断提出挑战。形形色色的研究方法——包括风格分析、功能论、象征主义以及社会历史分析等等——被用来解说石刻的形式和内容。通过几个世纪以来的连续著录和讨论,武梁祠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小小祠堂本身所限定的范围。可以说,对它的研究已使它变成各种相互补充或对立的理论及方法论的竞技场。

本书的研究回应从以往武梁祠研究中生发出来的四个主要方面,每一方面对于未来学术的进展都极为重要。第一方面是对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进行清点和著录。尽管这些遗存对研究东汉图像艺术是极重要的资料,但相互矛盾的断代、祠堂归属以及编目等诸多问题仍然存在。此外如错录铭文等问题更使人迷惑。通过重新检验发掘记录、以往著录以及复原设计等材料,本书希望为武梁祠和它原来所处的环境,即武氏家族墓地,提供更完全、准确的信息。

第二方面是对以往武梁祠研究做一系统回顾。如前所述,研究武梁祠的漫长学术历史已成为这一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时候,二手资料已成为我们知识的主要来源。举例来说,古代作者记录的某些材料早已散佚,对祠堂原来的环境的了解也只有通过追溯其发现的历史。最重要的是,这一历史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检验汉代艺术研究中的方法论,以及每个作者在其著书立说时的严谨程度。

第三方面是重新探讨武梁祠石刻的图像内容。许多学者都曾试图识读和解释这些石刻以及榜题,尽管各自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但所做的解释并非完美无缺。汉代艺术的学子需要对武梁祠图像主题的更准确的辨识,也需要更为标准的榜题录文和英文翻译。这种研究可以说是在“图像志”(iconography)层次上的研究,将为更深入的、对综合单独母题的完整图像程序的解说打下基础,而这种对图像程序的解说可说是本书的最终目标。学者们已指出只有把东汉时期的纪念性石刻放到它们原来的建筑环境中才能对其产生正确理解。但是在将这种想法运用到研究中的时候,这些学者常常试图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希望这一模式能够适用于解释所有的祠堂甚至是墓室装饰。但是在我看来,在寻找这种普遍模式之前我们应该仔细观察单个的例子。历史上并不存在两个装饰得一模一样的祠堂,我们因此应该找到造成其异同的特殊条件和因素。



武梁祠中所刻的图像一方面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时尚,另一方面又肯定是根据设计者自己的想法而仔细选择安排的。那么这种流行的时尚是什么?图像的设计者是谁?他的想法是什么?跟随着这些问题,对武梁祠的研究就会逐渐延伸开来,进入到考察武梁祠石刻与汉代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即进入到考察围绕武梁祠整个图像程序而展开的思想观念(ideology)。

本书上编检验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和以往研究。其中第一章搜集有关资料,围绕几个世纪以来武氏祠材料的发现、断代、祠堂从属、建筑形式以及墓地整体的情况进行讨论。第二章的目的是勾画出围绕武梁祠所展开的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我希望比较深入地呈现这个研究领域里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的趋势,而非仅仅是概括介绍个体研究工作并加以评论。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本章是建构汉代艺术史学史的一个尝试。附录二和三是对整个上编的补充。其中,附录二是武氏祠研究中重要事件的年表,而附录三则列出墓地中发现的石刻,提供有关这些发现的详细资料,包括尺寸、原始位置、目前所在,以及对它们的著录。

本书下编探讨武梁祠画像的图像设计程序及其思想内涵。这是全书的中心,以附录一为基础。如果说这个附录是对武梁祠画像的主题和铭文逐一进行图像志研究,下编的讨论则是把单个母题作为一个总体图像程序的组成部分加以解释。下编中三章的划分是根据这个图像程序的内在划分及祠堂建筑的形式来决定的,分别讨论刻于屋顶的图谶、左右山墙锐顶上的神仙世界以及三面墙壁上表现人类历史的画面。全书的结论部分以反思祠堂的礼仪的“原境”(context)而结束。